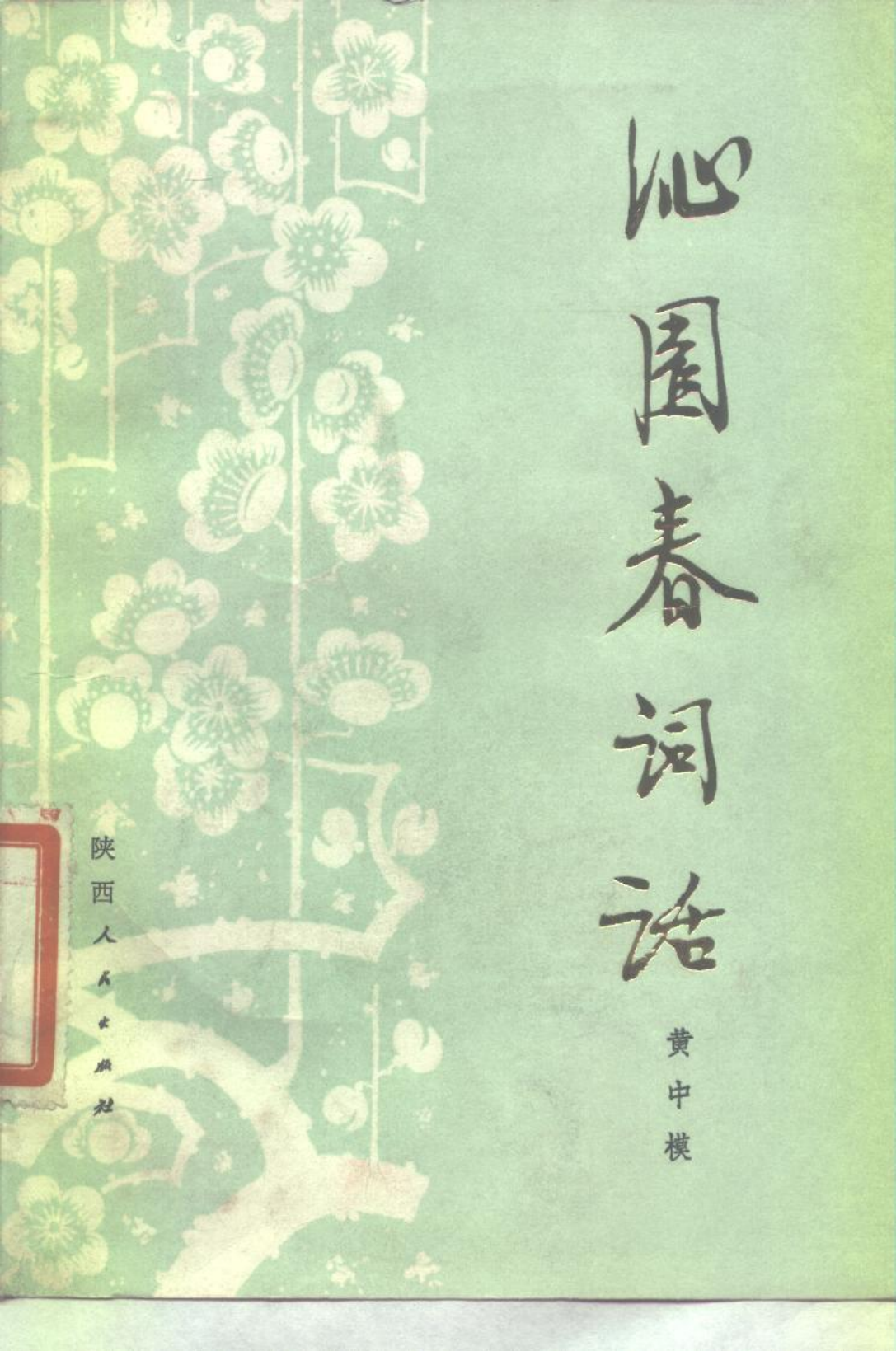




沁園春詞話

黃中模

陝西人民出版社

封面题字 茅 盾

封面设计 安 心

沁园春词话

黄 中 模

陕 西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75 插页 1 字数 114,200

1983 年 5 月第 1 版 198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统一书号: 10094.426 定价: 0.56 元

这是毛泽东同志书写的《沁园春·雪》手迹之二。

黄老先生道席
谢。新诗极读，甚为感
。柳文未看过，柳姓称
。过情，实在不恰高的。
电已照发。敬复
春安 毛泽东
二月四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写给黄齐生的第二封信。

序

臧克家

毛主席的《沁园春·雪》，是思想性很高、艺术性极强的一首词。一九四五年，一经在重庆发表，即为文艺界的同志们和广大读者所热烈欢迎和热爱，传诵一时，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因而，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嫉恨，嗾使御用文人，向这首名震一时的佳作，向毛主席本人，进行卑劣的攻击，喧嚷嚷嚷，众犬狂吠。郭沫若、柳亚子等许多同志，对《沁园春·雪》群起和作，并为文怒斥国民党反动派，揭露其卑劣无耻的谰言，得到群众的拥护，毛主席的这首词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流传。

围绕着《沁园春·雪》的这场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情况，我知道一些，因为那时我正在重庆，但了解得并不全面，也没有作过调查研究工作。最近有机会读到重庆师范学院黄中模同志写的《沁园春词话》，很高兴。这本词话，将当年有关毛主席《沁园春·雪》发表之后所引起的斗争以及有关资料，汇集在一起，并将毛主席的原作、其他同志的和作一一加以解释，无论对毛主席诗词从事研究工作的同志，还是一般读者，都有用处。黄中模同志在搜集、整理、解释

各方面，花了不少的精力与时间，作出了贡献。我对毛主席诗词，一向热爱，但只是欣赏，并未下过研究的功夫。读了黄中模同志写的《沁园春词话》，增加了知识，得到的益处不少。能公开出版，以飨大众，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序

霍松林

为了更好地把握现在、奔赴未来，有必要弄懂过去。因此，表现历史的著作总是需要的。黄中模同志的这部《沁园春词话》，实际上是具有历史性质的著作。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毛主席从延安飞抵重庆，同国民党进行了四十三天的谈判。这期间，柳亚子先生作了一首七律送给毛主席，并向毛主席“索句”，毛主席便把一九三六年二月所作的《沁园春·雪》抄给他。当毛主席回到延安之后，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柳亚子先生的和词。毛主席的原作，也因而被爱好者抄去，发表于重庆《新民报晚刊》。

一石激起千层浪。毛主席的《沁园春·雪》一发表，立刻轰动山城，波及全国。和词、论文，乃至其它样式的文章纷至沓来，涌现于不同性质的各种报刊：或衷心赞颂，或恶意谤伤，笔枪舌剑，针锋相对，形成了文艺斗争的高潮。

正如毛主席在《关于重庆谈判》一文中所指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虽然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却始终以坚毅的步伐，迈向光明的前途。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光辉照耀下从事四化建设的亿万人民群众，无不熟读毛主席的咏雪词，并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

朝”而自豪，然而又有多少人、特别是新社会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能够了解围绕着这首词，还发生过那么一场尖锐而复杂的斗争呢？

早在一九四六年，锡金同志就发表过一篇《咏雪词话》，但他意在解词，不是为了总结那场斗争。日本学者菊地三郎的《毛沢東の詞〈雪〉臆釈》（载朝日新闻社刊《アツア文化圖書館開館紀念論文集》），洋洋数万言，网罗了不少有关资料（特别是国外的资料）；但目的也在于“臆释”词义，而不在于追述那场斗争。黄中模同志的这部《沁园春词话》，却在详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从重庆谈判前后的政治形势出发，展现了那场斗争的全貌，揭示了它的实质。这就为我国现代文学史填补了一个不应有的空白。

就我的感受而言，黄中模同志的这部书还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紧密地联系时代背景，对十二首正面的《沁园春》词和七首反面的《沁园春》词的不同思想内容作了解释和评论，爱憎分明，却避免了抑扬过当的毛病，显示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第二、汲取前人论词的某些见解，对若干正面词作的艺术特色作了比较细致的分析，不乏新意。对于广大读者，这都是很有帮助的。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时代一去不返了！“晴日”当空，“看”祖国的现实：“红装素裹，分外妖娆”。回顾过去，放眼现在，展望未来，有谁不豪情满怀、信心百倍呢？让我们高唱战歌，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吧！——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一九八一年九月写于见山楼

前 言

——重庆谈判后文艺战线上的一场斗争

一九四五年，继重庆谈判之后，在重庆文化战线上，发生了一场特殊的战斗。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艺界同国民党反动派的御用文人，围绕着毛主席的《沁园春·雪》，以唱和词为形式，所进行的短兵相接的斗争。

边谈边打和文艺斗争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的大好形势，为贯彻我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广阔的前景。但是蒋介石反动派在抗战胜利后，为了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统治，决心发动内战。在国家命运处于非常危险的严重关头，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向人民指出了内战的危险性，另一方面又向全国发出了制止内战的呼吁，获得了广大进步力量的同情与支持。

蒋介石反动派为了欺骗中国人民和世界舆论，争取时间部署“围剿”革命人民的兵力，以便适时发动内战，消灭人民革命力量，从八月十四日到八月二十三日，接连发了三封电报至延安，邀请毛泽东同志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中共中央为了向全国人民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的和平诚意，并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揭穿蒋介石侈谈团结，玩弄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决定派毛主席和周恩来、王若飞同志到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毛主席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廿八日到重庆，在同国民党进行的谈判中，与蒋介石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取得了重大胜利之后，于十月十一日返回延安。

重庆谈判的结果，虽然只发表了一个《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但是在政治上却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极大的主动，而使国民党陷入被动，成绩是巨大的。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一面同我党进行谈判，一面又在挑动内战，积极进攻解放区。一九四五年九月，在山西上党地区，以三个师的兵力，向晋东南解放区发动进攻。这次进攻被革命人民彻底粉碎之后，又先后在全国各地向解放区进犯，动员的部队达七十多个师。可是这些军事进攻，都被革命人民打退了。蒋介石在一九四五年冬虽然撕毁了《双十协定》，但是当时他对全面内战还没有准备好。因此，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国民党政府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压力下，不得不召集有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这个会议上，通过了一系列有利于和平民主的决议，并且在一月十日发布停战命令。事后，蒋介石不遵守政

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和停战命令，在一九四六年上半年，调集军队继续在许多地区向解放区进攻，在东北进攻的规模更大，形成了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

这种众所周知的错综复杂的边谈边打的情况，就构成了自重庆谈判到政治协商会议前后一段时间的政治斗争形势。而围绕着《沁园春·雪》的一场斗争，则是这种革命与反革命的政治斗争在文艺战线上的反映。它是当时国内复杂斗争的一条战线。这就是敌我双方围绕着《沁园春》唱和词进行斗争的政治背景。

雷惊天地与“鸦鸣蝉噪”

敌我双方围绕《沁园春》咏雪词的斗争，有一段从内到外的酝酿与发展的过程。

毛主席到达重庆后，柳亚子先生做了一首七律诗来称颂毛主席。在那首诗中，表现了柳亚子先生对中国共产党的崇敬，但又反映了他对局势的认识还不够明确。毛主席为了启发和帮助以柳亚子先生为代表的广大爱国民主人士提高认识，便应柳亚子“索句”之请，把《沁园春》咏雪词书赠给他。毛主席书录这首词有两种手迹：一种是写在“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信笺上的；一种是写在柳亚子先生的纪念册上的。时间大致在一九四五年中秋节之前。据戈宝权同志的回忆文章说，在这年中秋节（公历九月二十日）的晚上，中共中央南方局、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的同志，在红岩村礼堂举行晚会，欢迎毛主席。他们在会上，即“初次读

到了毛主席为柳亚子题写的光辉词章《沁园春·雪》，而且大家很快就都能背诵出那些豪迈的句子”^①。可见，毛主席还在重庆的时候，这首词就已经在红岩村开始流传了。

十月十一日，毛主席返回延安之后，柳亚子先生写了和词，并把这两首词抄好，送给重庆《新华日报》，希望他们发表。《新华日报》因毛主席回延安去了，便向柳亚子解释说：“发表毛主席的作品，非得到他的同意不可，要到延安去请示。”柳亚子认为：“这样办，太浪费时间了。”就主张把他的和作先在报上发表。这样，柳亚子先生和毛主席咏雪词的《沁园春》，便首先在《新华日报》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第四版上发表出来。据柳亚子先生的回忆说：

外边看报的人，知道有我的和作，必定有毛主席的原作，希望看原作的人太多了。……最后，不知如何，被一位《新民报》的记者弄得了一份原作，便发表出来。不多几日，《大公报》便把《新民报》上所登的毛主席原作和《新华日报》上所登我的和作，合并发表。于是赞成者和反对者都大和而特和，成为一个轰动全国的高潮^②。

这是柳亚子先生讲的一个粗略过程。它的详细情况还要复杂得多。

最先得到毛主席原作的不是《新民报》的记者，而是当时在重庆《新民报晚刊》负责编辑《西方夜谈》副刊的吴祖光同志。十月下旬，他从三个朋友的手中，得到了毛主席的

咏雪词的传抄稿。据吴祖光同志讲，他是首先从画家黄苗子处抄来诗稿，黄则是由王昆仑先生处抄得的，但是其中有短缺，后来又从另外两处抄到，都是不全的诗稿，尽管这三处的抄稿都有遗漏，但把三个传抄稿凑起来，终于得到了完整的《沁园春》咏雪词了^③。这时他就想把这首词发表在他经手编辑的副刊上。

但是有人提出了一些理由加以劝阻。主要的理由是说毛主席不愿意外间知道他是会写旧体诗词的，如要发表这首词，应当征得作者的同意。但是在《新华日报》发表了柳亚子的和词以后，吴祖光认为毛主席不愿外人知道他写旧诗词的秘密便已不存在了。此外，《新华日报》是共产党办的报纸，当然应受党的主席是否同意的约束，而自己编的却是一家民营报纸，并不存在这样的约束。特别是当他得到这首咏雪词的传抄稿之时，便被这首词的涵浑奔放的磅礴气势所激动了，认为这是毛主席睥睨六合，气雄万古，一空倚傍，自铸伟词，是一个副刊编辑能够得到的最精彩的稿件。他便不再征得任何人的同意，而在十一月十四日的重庆《新民报晚刊》的《西方夜谈》副刊上，把毛主席的咏雪词发表出来。标题是：《毛词·沁园春》，并在后面加了一段按语：

毛润之先生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据氏自称，则游戏之作，殊不足为青年法，尤不足为外人道也。

十四天以后，重庆《大公报》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同时转载了毛主席的咏雪词和柳亚子先生的和作。

这首词发表之后，顿时轰动了山城，并传到全国，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爱。它犹如一道耀眼的闪电，划破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夜空，犹如雷惊天地，掀起了一道冲激旧世界的革命狂飙。

在这道革命狂飙冲击之下，感到惊恐的是国民党当局。他们对主管新闻方面的官儿大加训斥，并且通过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新闻局副局长邓友德来向《新民报》施加压力。邓友德对《新民报》的总经理陈铭德和邓季惺进行申斥，并给予警告，认为发表毛泽东的咏雪词，“是为共产‘张目’，向共党投降”。由于邓友德与陈铭德有亲戚关系，因而又私下对陈邓二人说：“老兄！你们倒好玩，我们的日子不好过呀！”《新民报》的董事长肖同兹，也因此而叹息：“我恐怕干不下去了。”④

接着就是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策划和布置对这首词的“围剿”。在蒋介石侍从室的指使下，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直接召开会议，布置他们控制的报刊同时以和词的形式，对毛主席与柳亚子先生的《沁园春》唱和词进行围攻。

《中央日报》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四日，在《中央副刊》上，用头条位置，发表了署名为“东鲁词人”和“耘实”的两首《沁园春》和词。

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办的《和平日报》（原名《扫荡报》）也于十二月四日，发表了反动文人易君左写的《沁园春》和词，并号召喽罗们都来围攻。

反动的《益世报》，还是在十二月四日，发表了一个反动文人写的题为《沁园春·吊北战场》的和词，进行无理谩骂，极端反动。

这三家反动报纸，都是在同一天刊登攻击毛主席与柳亚子的《沁园春》词的“骂人之作”，形成了一种围攻的局面。

接着由国民党行政院文官长吴鼎昌控制的《大公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的长文。此文从十二月八日起到十二日止，用五天的时间才连载完毕。它攻击毛主席的咏雪词是“述怀之作”，有“帝王思想”。自后，国民党控制的报刊无不鹦鹉学舌，连续地发表反动和词与文章，计有和词近三十首，文章十余篇，大有群犬吠日、鸦鸣蝉噪之势。

据了解国民党内情的同志说，国民党反动派对毛主席的文章是不敢轻易地进行围攻的。唯恐引起人们的注意，起着代共产党宣传的作用。这次围攻《沁园春》，是经过国民党的决策人物充分研究和策划过的。他们荒谬地分析词章：认为词中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是作者自己的“比量”；他们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发起这一“围剿”，就会争取人心，挽回他们在重庆谈判桌子上和军事战线上遭受的惨败。因此他们不惜在文艺战线上倾巢出动，对《沁园春·雪》大肆围攻了。

然而客观事物的发展总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当时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取得重大胜利的革命人民，当然不会在文化战线上容忍国民党当局的胡作非为。重庆革命

文化界在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进行了及时而有力的回击。这就构成了在重庆谈判之后，直至内战爆发之前，在文化战线上的一场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尖锐的斗争。

在斗争中，一马当先，冲锋陷阵进行反击的，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郭沫若同志。他写的《沁园春》和词，刊登在《新民报晚刊》的《西方夜谈》副刊上，向国民党的攻击打响了反攻的第一枪。接着他又写了《摩登唐吉珂德的一种手法》，此文载于《萌芽》一九四六年第七期，严厉地批驳了国民党当局控制的报刊及其御用文人诬蔑咏雪词的无耻谰言。

在郭老的带动下，重庆的《新华日报》、《新民报晚刊》、《客观》、《民主星期刊》等报刊，都刊载了进步的和词与文章，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围攻，持续地进行了反击。

重庆文化界对国民党的围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是在广大解放区的密切配合和支持下进行的。首先是毛泽东同志及时义正词严地驳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诬蔑。由于中共中央南方局向党中央报告了在重庆方面，敌我双方围绕着《沁园春》咏雪词进行斗争的情况，毛主席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给黄齐生先生写了一封信，对黄先生写《沁园春》投入战斗致意，说他读了黄先生的“新词”以后，“甚感盛意”。同时还将王若飞同志寄到延安的“报载诸件”，即其中寄去的正反两方面的和词，给黄齐生先生观看。毛主席说，其中“国民党骂人之作，鸦鸣蝉噪”，只能起到使人“可

以喷饭”的作用^⑤。

毛主席的这封信由黄齐生先生的亲友保存下来，直到最近我们才在有关单位看到了毛主席的亲笔手迹的影印件，才知道那是一封有关《沁园春》唱和词的信件。这是因为黄齐生先生于十二月写了一首《沁园春》和词来参加反击国民党的战斗，毛主席才写那封信的，而黄齐生先生也是在十二月上旬接到王若飞同志的信，知道重庆方面的《沁园春》唱和情况以后，才写那首和词的。毛主席在信中说的“其国民党骂人之作”的“作”字，显然是指文艺作品。纵观一九四五年下半年的报刊，在国民党报纸上登载的文艺作品，是骂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没有看到有别的东西，只看到谩骂《沁园春·雪》与对柳亚子先生进行攻击的反动和词与文章。同时既然可以称为“鸦鸣蝉噪”，可见是一大群人写的作品，绝非一个人或一篇文章，就可以算得上是“鸦鸣蝉噪”的。够得上“鸦鸣蝉噪”的，只有国民党反动文人炮制的大量反动和词与文章了，毛主席认为它们只能起到“可以喷饭”的作用。

“喷饭”一词，出自宋苏轼《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发函得诗，失笑喷饭满案。”原意是说其诗可笑，后来常用此语来形容可笑之至的事情。国民党反动派对《沁园春·雪》作出的种种荒谬解释与攻击，毛主席认为他们极为可笑，这无疑是对他们的诬蔑与攻击给以轻蔑的嘲笑和严厉的批判，有力地支持了重庆革命文化界反击国民党围攻《沁园春》咏雪词的斗争。

除了延安黄齐生先生写了《沁园春》和词以外，当时在